

平西交通情报站站长梁波

● 祁月

在庄严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二墓区剑字组内，苍松翠柏间有一座墓碑，碑上刻着“梁波烈士之墓”，大理石的墓座上鲜花簇拥，绿草如茵。

梁波(1910~1947)，原名杨思光，而按门头沟政协文史委编撰的《千年宛平》和海淀区政协《文史资料选编》中都介绍：梁波(1909~1947)，原名杨思忠，两者的记载略有不同。梁波出身于天津一个封建大家庭，父亲是经营棉纱的商人，是个非常专断、生性残暴的人。梁波从小就有正义感，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对母亲打骂，他每次都要站在母亲一边，保护母亲。妹妹因父亲专制干涉她的婚姻，得了精神病，死在了精神病院。父亲给他定的一门亲事，被他坚决退掉，因此他与父亲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芥蒂。他的舅父刘宝光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刘宝光的进步思想使得梁波对丑恶的封建家庭和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不满。

上世纪20年代末，梁波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由于校内的进步气氛感染了他，使他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常在校刊《南开双周》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死神”、“诗冢”都是与他的名字谐音。中学毕业后，于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父亲在洋行给他谋到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被他坚决拒绝了，说：“我死也不做洋人的买办。”由于他在大学期间接触到几个共产党人，毕业后曾到山东《济南日报》工作，经常把北平各校抗日报刊上的文章选登在副刊上。他也发表同情“一二·九运动”抨击政府镇压学生行径的文章，因此被报社开除。回到北平后，他与几个朋友筹资创办了《文地》月刊，但由于经费不足，

仅出版了两期就停刊了。也就是在《文地》月刊上他第一次使用了“梁波”这个笔名。

1937年春，他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斗争的工作。他在1937年冬入党，1938年8月调入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民先”队的工作。1939年5月、6月间按党的指示到平西工作，任冀热察区党委秘书长，1939年3月中共昌宛联合县成立，1940年10月因县委书记杜存训调任，梁波接任昌宛联合县委书记。他在任期间积极在各村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和村政权，开展反特和反“扫荡”的斗争，成立昌宛县游击大队，并且很快扩编为一支拥有200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日军在秋季大扫荡时在斋堂建立了一个大据点，当时县委机关就在塔河附近的张家铺、马家铺，梁波带领着昌宛县人民同扫荡的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一次日军的大扫荡中，梁波和县委机关同志们从马家铺撤退上山，敌人已经到了山下，他们在山上，傍晚时分，下起了大雪，大部分人趁着夜色滑到枫林铺去了，由于梁波是高度近视，眼睛看不清，他只好和其他两名同志在山上蹲了一宿。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中共北方分局撤出北平，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1939年6月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派史光、张永宁等在妙峰山一带开展交通情报工作。按照当时的情况，没有建立固定的情报站，只是搞了武装交通情报工作，1941年1月北平地下党的情报系统分为华北局域二部和中央社公部两个系统。中央社公部的晋察冀社公部决定在平西建立地下交通站，

社会部负责人许建国派王友(钟子云)为第一任平西情报交通站站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领导建立起多条交通线，使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北平之间建立起巩固的联系。因此1941年的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作了结论“上下级的交通是城市的血管”。城工委有两项任务：交通、情报两条线，1942年间梁波从城工委奉命调到冀热察区党委社会部工作。1943年7月王友接替许建国任社会部负责人，平西情报交通站站长由刘景平担任，1944年5月刘景平调任社会部情报科交通组长，由梁波任站长，这时平西情报交通站根据形势的需要，驻地由河北易县的裴庄迁到龙居、上隘等处，但仍管理妙峰山、保定2个分站。

1944年11月，妙峰山分站升格，归社会部直辖管理，原分站改为平西情报交通站，站长鲁健调任昌宛县公安局局长后，县委书记梁波任站长，情报交通站的成员有：张冲、贾振海、张占才、赵玉林等人，1945年1月梁波的爱人黄云也调入平西站，辅助梁波的工作。抗战时期，石景山地区有不少人参加了八路军，涌现出很多抗日英雄，像八角村梅广江家的大儿子梅老大，从小在门头沟韭园苑家庙剃度入僧，随师傅姓苑，取名苑凯轩，法名能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参加了平西游击队，因为他年轻机灵、身份特殊，出外完成任务方便，不易被日伪怀疑，于是他成为了平西交通站的交通员，跑京西—妙峰山—北京城线，多次圆满完成惊险的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评为优秀交通员。平西站主要的任务是：

1. 开展与东北抗联的联络工作。
2. 负责接送出入敌占区的过往人员、传

递情报，运送军用物资。

3. 负责物色情报人员，派到平津工作。

4. 负责电讯联络。

平西情报站对外叫民运组，常驻妙峰山下涧沟村，有十六、七个人，因为地处偏僻的山区，物资药品匮乏，生活艰苦，梁波带领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工作。梁波虽然是富裕家庭出身的领导干部，但他丝毫也没有一点架子，他常与老乡一起唠家常、同吃一碗饭。一次村农会主任赵凯得了疟疾，病得很厉害，他二话不说，把自己存下的一点珍贵的特效药全送给了赵凯。

平西站有一部电台，负责收集北平、天津至东北交通员的情报后拍发到边区社会部，为了更详尽迅速掌握情报，他不顾危险，常深入到敌占区北平河一带，与北平城里来的交通员当面交接，这样交通员当天即可返回北平，安全方便。

在解放战争中清风店战役前夕，梁波领导的平西站及时向解放军通报了敌情，使解放军得以成功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当国民党军阴谋大举进攻张家口时，平西站又一次及时地报告了敌情，使我军避免了遭受损失，聂荣臻对平西站做出过重要的评价：“相当于十万雄兵。”

1947年9月17日，梁波在海淀七王坟与交通员接头后，在返回的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他为了保护重要文件，被敌军用刺刀刺死，死时享年38岁。事后涧沟村的乡亲们和情报站的战友在他牺牲的地方找到了他的遗体，抬回到涧沟村，把他安葬在村南的山坡上。1953年2月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将梁波的遗体移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骆驼户“郝大门儿”的抗战

● 门学文



古城村民回忆，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前，全村有骆驼2500头，几乎家家养骆驼，搞运输挣驮脚钱。前街87号保存着一处老宅子，四梁八柱的房架子，灰砖到顶，清水脊，石板瓦覆盖。屋里有火炕和部分老家具，如条案等。那就是“郝大门儿”，民国时期京西最大的骆驼户郝家的宅院。那时，京西养骆驼的多了去了，但说起养骆驼运煤的“郝大门儿”来，京西老人们没有不知道的。但他们怎么发的家？如何衰败的？能说清楚的就不多了。

“郝大门儿”的开山是郝廷余，成家后就养骆驼，搞运输。先是养了2头，后来发展到几把儿，把门头沟的煤炭往城里倒腾。他有两个儿子，大的郝国江，小的郝国山，长大后成了好帮手，对如何养骆驼琢磨的算到家了。他们的发家，得益于当时的“东来顺”掌柜。怎么说呢？原来，郝国江哥俩对煤铺门儿清，东来顺接了他们驮来的煤后，涮羊肉生意越来越火。那煤，油性大，好烧还不出烟，与其他驮户送的一比，成本还低，就专要他们送来的煤。那煤要的多，哥俩也没那么多骆驼，就发了愁。愁什么？买卖来了，没钱买骆驼。掌柜的看出来，瞧他们实诚，就掏出1200大洋买了60个骆驼给他们经营，自己入股分红利。他们会养骆驼，京西又有的是煤，哥俩身强力壮，又不怕顶风冒雪的辛苦，“郝大门儿”家就发起来了。三年后，“东来顺”掌柜还觉得骆驼的利小，把骆驼送给了他们，叫他们用驮煤的脚慢慢还钱，郝家的骆驼就多起来了。

家业一犬，就盖房子置地雇骆驼客，那

处宅子就是那时候盖起来的。因为做的大门道在村里最大也最讲究，人称“郝大门儿”。他们的骆驼院旧址，在今天的村西树神庙街1号，当时有12亩地那么大。四外有石头院墙，还花3000大洋专门打了一眼深井，供一院子骆驼饮水。从此，郝国江就走南闯北跑江湖，弟弟则在家里守业。

“郝大门儿”一生中最高傲的事情，莫过于参加了二十九军最初的喜峰口抗战，亲眼见识了二十九军大刀的威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日寇占领热河后攻打喜峰口，国民党西北军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奋起抗日，仗打了两个多月。郝国江正在那一带拉骆驼，连骆驼带人被军队征用。郝国江痛恨日本鬼子，钦佩二十九军的抗战爱国，感到能为抗战出力是自己的荣幸。当时，部队找了1000多头骆驼，运粮运物运军火，看郝国江懂行，就委任他管理。他精心管理骆驼，确保二十九军的后勤运输，经常冒着炮火拉骆驼往前线运输粮食、弹药、药品。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没日没夜地干，使骆驼队发挥了最大的运输能力。由于蒋介石不支持二十九军的抗日，战争失败。但部队对郝国江的组织运输，还是满意，也没少给钱。他的骆驼，每头用一天，部队就给一块大洋，还给他不少的管理费。据说，郝国江回到古城村的时候，骆驼背上驮的都是现大洋！

“郝大门儿”最兴盛时，房屋场院不算在内，还有20把儿骆驼(每把儿6到8头)、520亩地！他们的骆驼去房山坨里、周口店，去门头沟城子、圈门，驮上煤就往城里煤市送，两头一年一结账，还有十六、七个伙计。由

于骆驼成群，运力最大，“郝大门儿”名震京西。当时，京西养骆驼有名的北辛安的悦来家、悦兴家，衙门口的陈小院、兴隆店，都无法与“郝大门儿”相比！

京西有句土话：“家财万贯，活物不算。”是说养牲口发的财像流水，靠不住。“郝大门儿”家最红火的时候，内部突然闹开了分家，开始七零八落。分家后，“郝大门儿”真正的顶梁柱郝国江不倒腾煤了，而是到城里花市大街驮“大货”(百货)，走内蒙。他有魄力，人缘好，但时运不济，灾祸频频。

郝国江担任过古城村秉心圣会的“会头”，很受村民的敬重。他个子矮胖，脾气急，平时爱骑头大骡子。有一年，他驮大货走张家口到了坝上，被一伙土匪绑了票，拿货物换回一条命，还损失了好几把儿骆驼。几年后，他又驮大货走东道兴隆山去内蒙古，半道再次被土匪绑架，损失了骆驼和货不说，还被土匪扣下三个骆驼客，只得从北京典房子卖地借钱赎人。接二连三的惨祸，使郝国江赔光了家产，还欠下不小的债务。正当他有东山再起时，偏偏骆驼脱蹄(染上了蹄疫)站不起来。他急得一病不起，48岁就告别了人世。

几乎同时，“郝大门儿”的另一支郝国山，去内蒙古给骆驼歇夏贴膘，遇上了白匪老毛子，被抢去了五六把儿骆驼，只身回到了家乡。从此，“郝大门儿”的骆驼生意彻底歇架，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京西古城村的老骆驼户，提起骆驼来如数家珍。他们说：“牛走土，马走草，骆驼走沙不用叫。”意思是走草地骆驼不如马快，而走沙地骆驼比马快得多。骆驼的脚

趾软，最怕走山路，而在口外则陷沙不深，步子又轻又匀。骆驼有单峰和双峰，单峰的力气大。它们的胃里有许多存水的肉包，饮一次可以好几天不喝水。它们的肉峰，能贮藏脂肪，喂饱草料后可以靠反刍，七八天不吃，驼峰快没时，你不喂可就不行了。用骆驼搞运输，就得想办法保护它。软屈护其峰，扁鞍护其背，轻牵护其鼻，走山路要给它戴脚套，喂水后还要给它点盐……但有了公路后，骆驼就不行了，只能改套大车了。

骆驼曾给古城村带来了财富，骆驼户们感激骆驼，敬重“马王爷”。古城村西庙朝阳庵的东侧，有条往北的胡同叫马神庙街，西庙东配房南端原有一间马王庙。马王俗称马王爷，主管六畜，骆驼户们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要放假一天，在马王庙祭祀马王，送神码子、元宝、千张，上红蜡、烧高香，供上羊肉、鲤鱼、雄鸡和白酒，磕头行礼后，聚餐一顿。此习俗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停止。除在马王庙有祭祀活动外，古城村几乎每户在家里设马王爷神龛，龛下长期烧高香，摆供品，龛里有马王爷神像，龛两侧的对联是“宝马驮来千倍利，钱龙引来四方财”，横批是“如其在上”或“敬神如在”。

“城中千烟复万烟，仗尔西山运煤石。”

“柳条筐压峰高处，阔步摇铃摆骆驼。”

骆驼是北京历史上的功臣，为老北京服务了几百年，还为抗战出过力。京西“郝大门儿”家的兴衰，使人想起了“郝大门儿”那段抗战的经历。

(本版材料由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提供)